

贾冬阳 编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想的临界

——张志扬教授荣开七秩志

「六五鼎黄耳
金铉利贞」

思想的临界

——张志扬教授荣开七秩志

贾冬阳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临界——张志扬教授荣开七秩志 /贾冬阳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617-6642-2

I. 思… II. 贾… III. 哲学思想—中国—现代—文集
IV. B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0412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思想的临界——张志扬教授荣开七秩志

贾冬阳 编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刷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x 100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642-2/B·440
定 价 34.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前 言

张志扬恐怕是我国学界学历最低的哲学教授——如今六十岁以上的教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不算稀奇，因为我国到 80 年代才初建三级学制，但张志扬连本科学位都没有……

日本以数十万大军攻占武昌后的第三年(1940 年)，张志扬落脚在这个“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古城，父亲是长江码头上的“脚力”(挑夫)，老人家断乎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中国未来新时期的思想界“脚力”。

高中毕业后，张志扬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但没有如愿上大学念文学，命运莫名其妙地分配他进了农机学院，时在 50 年代末——两年后，因实在念不进农机，张志扬主动退学，次年重考大学，虽成绩优秀却再次被分去农机学院。张志扬干脆不去报到，放弃当大学生的资格，到武汉钢厂夜校任语文教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张志扬年方 26 岁，次年便莫名其妙地被捕，一关七年——那个年代被捕入狱的人如今大多有了一段光荣历史，张志扬的单身囚室对面的单身囚室关的就是一位老资格共产党人。神奇的是，张志扬在狱中开始自学哲学和德语，七年狱历等于念成哲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一同入狱的其他人大多要么疯掉要么乘放风时跳楼走了……莫名其妙地出狱后，张志扬被分派到一所乡村小学喂猪，一喂三年，可以算作他的博士学历——张志扬最早的哲学论文是在猪圈旁边写就的。70 年代末，百废待兴的国家成立社科院，设考招聘研究人员，正在喂猪的张志扬凭狱中学力考得副研究员职称。我念研究生时，读到他在猪圈旁写的文思并茂的文章，感铭至深，禁不住给这位副教授写信时敬称“老师”(我在北大时的老师们，当时大多也都是副教授)，他却坚持自称“大哥”——等

我见到他时，果然一副大哥样，从此视为大哥……直到如今，坐过七年单身牢狱的张志扬，身板仍然硬朗如大哥。

张志扬的学术生涯始于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从湖北省社科院调至湖北大学，受命支撑该校德国哲学研究所，90年代初南下海南大学，与友人共同筹建海大社科中心，教书育人至今。凭靠狱中修炼得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力，张志扬在八九十年代致力研究德国现象学和存在哲学；2000年后，张志扬的思索进一步在政治哲学、诸神学与哲学之间展开，用他自己的话说：哲学向政治哲学——用语言两不性去西方本体形而上性；政治哲学向诸神之学——用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去西方一元一神性；诸神之学向哲学——用元典的无形之道去西方意识形态性。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

荣开七秩之际，张志扬教授的研究生们自发地要呈献一部文集为先生祝寿，响应者除80年代的老朋友外，还有90年代和晚近几年成长起来的学苑新秀——按我国文人“秀才人情纸半张”的传统，亦按西洋学界习惯，文章均为各自的研究所得（仅两篇为译作），后一部分文章为古典作品解读，因此按所涉及的作品年代先后编排顺序。

刘小枫

2008年8月

于中山大学古典学中心

目 录

前言(刘小枫) / 1

贾冬阳等采访 在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 / 1

柯小刚 年龄的临界 / 31

黄 敏 临界的思想 / 60

方向红 试论在场的三个现象学向度 / 72

王凌云 论起誓:一个现象学的描述 / 82

贾冬阳 “之一间”:海德格尔探问“诗的本质” / 90

张 爽 哲学、智慧与异乡 / 126

勒维纳斯 谜与现象(朱刚 高松 译) / 142

丁 耘 《论语·八佾》选讲 / 155

乔 戈 “智慧来自苦难”:《阿伽门农》进场歌 / 175

程志敏 克里昂的言辞与修昔底德的意图 / 183

张文涛 哲学与神:读《苏格拉底的申辩》札记 / 214

甘 阳 从色诺芬到马基雅维里 / 225

伯纳德特 论智慧与哲学(杨晓强 译 张爽 校) / 229

林国华 漫议“君主教育” / 239

刘小枫 施特劳斯如何读马基雅维里 / 245

编后记(贾冬阳) / 288

在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

——张志扬老师访谈录

访谈地：海口

访谈者：郭照明、王凌云、贾冬阳、乔戈、杨晓强、张爽

〔说明〕戊子鼠年春节前，我们几位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回头将各自学习与生活经验中困扰自身的问题汇总在一起，编制成“访谈录”的样子（共十三题），希望通由此形式，既能在老师的指点下以及大家的讨论中深入思考问题，亦对日后进学的同学进一步了解这个“学科点”的特点而有所助益。在将“访谈录”发给老师时，出于必要的考虑，我们提醒他“访谈录”有可能会流传出去，实属不得已之举，老师当然更低调地不得已而为之。因有此考虑在先，我们得以在志扬老师“年龄”和“思想”双重临界的时机将此稿刊印。其间显隐，于察者或许有益。

贾冬阳 谨识

关于您的“学前经历”

我们都知道您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甚至具有传奇般的色彩（您在《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一文中曾说：“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点苍台白露泠泠，幽僻处可有人行’，方知成了命运。”），我们想首先请您谈谈您的如“影子回旋曲”般的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经历，对您日后的生活以及如今的思想“面容”具有怎样“原初赋形”的意义？最初激发您开始学习哲学的主要动因是什么？在《禁止与引诱》“自画像与面具”第50条，您为什么说“不是智力，而是承受力，把我引入哲学——这个死而复活的受难地”？我们还注意到，您在《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开篇就引用了“点苍台白露泠泠，幽僻处可有人行”这句诗，并认为它“成了命运”。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说它“成了”命运，您所讲的“命运”又该怎样理解？

我想先说一句，有些问题是回答不出来的。或者，它已经存在于你们获得问题印象的那个地方了。比如《读神的节日》、《禁止与引诱》、《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等。再说它没多大意思，特别是离开它的语境单挑它出来说，一定会走样的，像诉说，败坏你们阅读的原初印象，何必呢。我下面说的，仅仅是我读问题的当下感受，可能并不是你们想要的，很抱歉。

传统哲学或哲学家会说，只有把“这个”问题去掉，哲学才真正开始，因为哲学只问一般不问个别。对这种哲学来说，哲学家个人仅仅是中介，即是传送“这哲学”的运载工具，传送到了也就消失了，像亚里士多德“来了，写作，走了”构成一生，“完全消失于中介过程不在结果中留下任何痕迹”（黑格尔/马克思语）。如果“这哲学”是彻底的，它就应该是无名，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应该取消，用一个专名去命名通名或无名的哲学岂不背谬？之所以“这哲学”如此强调一般，那是它把自己太当普遍真理看待了，它有意无意掩盖起自己的意识形态本质，即掩盖了

个人进入存在(塞入或抽取—存在)的特殊角度了。

当然,否定哲学的无专名普遍性一点不排除不同个人的哲学会有非常不同的存在形式或时空形式,有些个人的哲学的确会成为中介消失于别的哲学中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大概属于这种消失的中介哲学吧。

我的经历只是突出了两点:一是来自苦难或不幸的存在意义,一是来自语言自身的临界启示。它使我像阴影一样地走在“幽僻处”,即更多地临界着被光遮蔽着的光自身的黑暗。这或许意味着,不同于传统哲学之现代转型的“现代中国哲学”,直接承担中国现代命运的“中国现代哲学”,本来就在苦难的阵痛中,它是从任何外界现成拿来人家的“现代哲学”所无法根植、代替或冒充的。借鉴的他人性永远是他人性,冒充不了自己性。而要做回这一点,看不见借光自身的黑暗,自己就只能笼罩在借光中,根本不能在借光的临界中找回(呈现)自己应有的身位。但我们沐浴在他人的光照中太久了。我只能走在“幽僻处”。这是命。如果一定还要我提示点什么,我请求你们更多地注意我的语言或文字。我终生寻求着它的质地与临界性。

关于“苦难”

从《读神的节日》(尤其是“墙”和“圈”两章)一书中,我们得知,您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6年5月被“有罪释放”,回武钢四中监督喂猪三年到1979年,正好十年。这种几乎粉身碎骨的经历让您对“文革”形成了怎样的印象与记忆?您在《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西学中取”的四次重述》一文中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存在”路线时说:“苦难有多种形式,战争的、非战争的,贫穷的、富有的,不道德的、道德的、甚至理想的,中国人都要缩影般地从头经历一番。最后,同根生的‘技术’跟‘阶级’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阶级’不是漂移,而是沉浮了。”我们该怎么理解阶级和技术的同根性以及两者触发的苦难形式?

正因为经历了文革,我才懂得“苦难”有多种形式,如“战争的、非战争的,贫穷的、富有的,不道德的、道德的,甚至理想的”。如果经验枚举,每一种都容易找到苦难事实证明。也就是说,总有大部分人无辜地落到各种形式的苦难中。我说“无辜”是因为无辜者平白承担着他人制造的风险。“本质主义”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否则就是“相对主义”,无进步可言。然而苦难毋宁正是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本质主义只把它认为“好的目的”拿来追求,既忘了自己目的的片面性,更忘了攫取目的的手段超出目的带来的破坏,还看作必然性,破坏不过是代价,更把破坏变成价值使被破坏者忍受“应该的”恶运,这就准备着或导致历史过程的双重背叛:目的遭遇反讽,恶运伸张正义。是不是“相对主义”了?不是,而是“本质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忘了它,就像“光”以为自己是纯粹的光明而成为双重遮蔽看不见自己的黑暗一样。

懂得这一点,并非要人放弃决断与行动,而是让人清醒自身的价值限度而谨慎从事、承担责任,并更深刻地意识到,即便是伟大的行动也难免“神圣的罪业”,从而保持敬畏。人想逃避到绝对正义中要么是狂妄,要么是自欺,只会导致更大的

苦难。

人的身位决定了他一方面不得不像蝼蚁匍匐于大地经受各种苦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仰望苍穹领受生存的启示与意义,所以,来自“苦难”与“神性”两极的教训是人的智慧的唯一源泉。注意,我说的是“智慧”,不是“智能”。前者靠近“神”,后者靠近“物”以至于“技术”而成为“无主体的主体”。古人非常懂得靠近“智慧”这个源泉,今人反而丢弃了或逃避了。他以为眼下的“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新三位一体才是幸福的保证。这样的“启蒙”,坦率地说,我开始怀疑起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怀疑是后续的,恰恰发生在我的处身性自由而自足的时候,他人的苦难才成为我直观的对象。

第三点“技术与阶级”,无非是前一个问题的特殊表现。其实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和“技术”都被当作历史之“物”即“生产力”的表现,至于这“生产力”是“体力”付出,还是“智力”付出,那不过是生产力的“物化”形式不同而已。换句话说,不幸来自“阶级”内部——与劳动力中“抽象劳动”相对的“具体劳动”(智力意识的对象化)和生产力中的“物的工具与原料”,两相结合而成的“技术”,取代了作为单纯劳动力的人。至于“物化”的后果究竟疏远化到何等程度以致反过来控制人到何等程度,那已是“物”的技术存在本性了,所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这个问题非常难谈,我只知道我不是技术主义者,也不是反技术主义者。现代技术科学,除了知道它的“自我证成”的“技术存在”之路外,实在不知道它会把人引向何方?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遗产问题

我们注意到，人们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做比较，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差别，法国人对“大革命”的研究几乎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史学”的高度并当作法兰西民族给予世界的“文化精神财富”，而中国目前连同各类知识分子对那一段历史中出现过的激情和思想几乎都看作妖魔而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事实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基本上可以说“一无所知”。我们想问的是：“文化大革命”是否是妖魔？它为中国人留下了怎样的遗产？“文革研究”是否有新的路可走？您曾说过，今后的研究工作将主要集中在“文革”与“偶在论谱系”上，那么，您将以怎样的“眼光”思入“文革”并将以怎样的“文字”书写文革？您将研究的题目初步定为《文革圣器与记忆碎片——谁是“文革遗嘱”的执行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请允许我暂时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我必须想好我面临的困难，当我有足够的能力加以克服，或许那时，以文字的方式立此存照，即便让不死的死把有死的生抓走了，也无须任何解释了。

关于“偶在论”

您在《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一文中说：“‘偶在论’，我的初衷或目的是‘中国现代哲学’之建立（不同于‘现代中国哲学’如‘新儒学’、‘马哲化意识形态’，当然更不同于‘西方现代哲学’如‘德国现代哲学’或‘法国现代哲学’或‘英美现代哲学’的中国版），虽然‘创伤记忆’、‘偶在论’都已是进入‘现代哲学的维度’之绪论和章节，但我不是没有注意到，特别是‘偶在论’，其范畴来源于西方，若无批判能力或防范机制，不管你意识与否，有一个暗含的前提你是当作‘自明性’携带着了：西学是普遍者，那么，中学或其他则是特殊者，当真落了‘欧洲中心论’及其‘东方学’的言荃……‘偶在论’恰恰是对西方‘哲学—神学—政治哲学’检讨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沿着它们自身的‘根据悖论’引申出来的。在这里，迄今为止愈演愈深刻的可作为纵横坐标的‘古今之争’与‘诸神之争’无疑是主要的参照背景。……‘偶在论’不是字面相联的‘偶然’、‘差别’、‘相对’的‘虚无主义’别名，它立足的是‘本体’非同一又断裂式相关的‘悖论’。‘本体’之‘悖论’式存在即‘偶在’，或只能按‘悖论’理解（与‘对立统一’转换为‘更高综合’的‘矛盾’无关），并根本地在‘启示’与‘理性’、‘超验’与‘经验’之间，尤其在人为的‘诸神’之间寻求‘自我限制’、‘自我指涉’的‘偶在空间’（悖论式断裂的生成空间）。它如何能在思想事实和歷史事实中建立起来？确切地说，我有足够的能力听从它的召唤吗？”

我们想请您对“偶在”范畴的西方来源略作说明，以及——您梳理“偶在论谱系”的目的是什么？您的“偶在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有何关系？同中国古典智慧如老子思想又有何渊源？网上有人认为您将“‘偶在’理解成了一个‘模态逻辑学’的问题”，认为这和“中古后期经院学暗合，早在那里，‘偶在’已经是个逻辑学的问题了”，您认为这种理解的问题何在？您为什么选取“偶在论”这个在“西方思想史”上充满歧义的词来定位您对存在的理解？它如何摆脱基督教背景？又如何描述、解释“中国经验”？如今，距您写作此文已经七个年头，文中

您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如“中国现代哲学”之建立?“偶在论”如何能在思想事实和历史事实中建立起来?)是否已经有了来自可能回答的牵引?

这个问题太大了。有一个原则我们共同遵守好吗?那就是,问题只关涉我,与别人无关。我向来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写的文字,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解释权利。

我的问题来源于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政治专制主义与哲学真理的关系;一条线索是真理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这两条线索都牵扯到西方,归根结底源头都在西方。说明一下,“西方”这个概念越来越含混了,我希望尽量避免通称,能具体就具体,习惯性的沿用指的主要是“西欧”,近现代才加进了“美国”。而美国已经把欧洲叫“老欧洲”了。它们本来就有“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区分。注意,我已经不在“进步论”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区分了。

80年代,由于具体的原因,我很快从反专制主义过渡到反真理,即反西方形而上学真理观,最后当然也就落到反形而上学本身的“本体论同一”这个根源上去。马克思有一句话叫“同原因作战”。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作为反叛者的马克思对作为构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反讽,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和警示。因为,它用一代人的速度重演着黑格尔:黑格尔非常清楚“西方哲学史是一个堆满头盖骨的战场”,结果转身他的头就被马克思砍下来了。现在又轮到我们来做马克思曾经做过的事。如果后来者总以为前人的真理不是真正的真理,只有自己才更真实地发现了真正的真理,而根本没意识到真理自身的意识形态本质,结果就不能不是这样:“抬你出去的人已经站在门口了。”这太使我惊讶了!我把这叫做“意识形态反讽”,即只要进入意识形态,没有不遭反讽的。当时(80年代),我还根本不知道尼采的名言“柏拉图主义是颠倒的虚无主义”。只是敏感到这个现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正因为如此,80年代上半叶,人们几乎都还沿着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呕吐”(宣泄)而进入海德格尔的“烦”、“畏”、“死”、“无”的“此在基本论结构”时,我已经只对“本体论差异”感兴趣了。很长时间我都宁愿叫“本体论差异”而不改口叫“存在论差异”。因为,前一种译法正是冲着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而去的。“本体论同一”叫“矛盾”、叫“辩证法”,而“本体论差异”不能叫“矛盾”、“辩证法”,只能叫“非同一差异”、“不确定性”。当时我还没有找到“悖论”、“偶在”这样的词。

80年代下半叶,写《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时获得“语言两不性”、“语言界面性”,使我有“临界思想”的意识。这就离“悖论式偶在”的思想不远了。90年

代中后期，一接触到卢曼的《宗教的社会系统中的偶在的转化》(1977年)，我几乎马上写了《卢曼的现象学方法：偶在性的模态演化》(1998年)。

由此安定了我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存在论差异”、“语言两不性”、“显隐二重性”、“奠基裂隙”、“悖论式偶在”。然后在教学中按着海德格尔的回归步伐上溯到“前苏格拉底”，以“偶在论谱系”为“临界的即显隐二重性”的解读线索，重读西方哲学史。所以，“偶在论谱系”完全是欧陆哲学史自身隐伏着的“阴影之谷”，盖因形而上学的光照历来行掩盖之实而取奠基之名。我不知道西方是否像我这样揭示它，即便在海德格尔那里，也还没有完全透射出来，或许他有哲学史内部的考虑吧。

最近，你们可能注意到我讲的《迷途问津》以及“西方意识形态三大根源幻象”。

你们可以想象，我为什么那么看重海德格尔墓碑上的一颗“星”，为什么把他的存在哲学表述为“知其是守其在”，以对应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

有了这个摸底，所谓西方哲学的“堂奥”再也不是任何人，无论中西，能掩盖得了的。当然我在课堂上讲到了另一面，构建的技术性越来越精湛而可逞一时之功。

虽然上述工作无疑准备了哲学前提的清扫，尤其是心理前提的清扫，毕竟没有进入“中国现代哲学”为何物的解答。到这时，我才发觉几乎没有时间回来做自己本该做的事了。“文革”再不写就写不成了，我必须作出选择。